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诠释译者的多维角色*

佟颖

摘要:“社会人”和“社会结构”使译者产生并扮演多重角色。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史中的译者角色界定与演变分析具有片面性。皮尔斯的“自我”概念与“社会人”异曲同工,“内心对话”模式暗示着符号意义的获得须经过社会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使用。以皮尔斯“三位一体”观为基础,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主要角色和各种次要角色。

关键词: 社会符号学, 社会结构, 社会人, 译者角色

A Socio-semiotic Explanation of Translators' Multi-dimensional Roles

Tong Ying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the “social person” and “social structure” require translators to produce and play multiple ro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semiotics, 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translation history present a one-sided view. Peirce's concept of the “self”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ocial person, and the mode of “inner dialogue” implies the acquisition of symbolic meaning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people in a specific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Pierce's “trinity” view, there are simil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or and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经典俄译符际文化信息守恒与失恒研究”(19BY211)中期成果。

author,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and source culture and target culture. The translator plays various major and minor roles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 socio-semiotic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person, translator's roles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19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礼德(M. A. K. Halliday)发表了一系列专著,指明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符号系统。1978年,韩氏出版专著《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该书体系上稍显零散,收录了韩礼德在1971—1976年发表的13篇论文,但阐述了共同的主题,即语言的社会符号性,由此,社会符号学被正式提出,之后,大批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符号学,使其成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语篇、情景、语码、语域、语义系统、社会人和社会结构等也逐渐被确定为该学科的核心概念。

社会符号学自提出以来就被应用于很多领域,发挥了方法论作用。在翻译领域,最先引入社会符号学理论的是奈达(Nida, 1982, p. 13),他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国内翻译界对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关注度很高,但总体看来,主要是运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分析一些翻译现象,集中探讨了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实现等问题,并未对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做本体论研究。我们认为,鉴于社会符号学的跨学科性,应该从该学科的主旨出发,探寻核心概念与翻译中基本问题的关联性,如“语篇”之于翻译单位,“语码”和“语域”之于翻译过程,“语义系统”之于翻译等值,“社会结构”之于翻译动机,以及“社会人”和“社会结构”对译者的产生和角色演变的影响,等等,从而构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本文尝试探讨“社会人”和“社会结构”与译者角色之间的关联性问题。

一、译者角色的产生

“角色”一词原本用来指称舞台剧、影视作品等表演形式的剧中人物。从符号学角度看,“角色”是一个有形符号,在特定的剧情中与剧中其他人物保持特定的关系,通过外貌、气质和言谈举止具象化并再现作家头脑中的人物。1935年,米德(G. H. Mead)将“角色”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将其视为社会群体的构成因素和社会组织的根本,是人们对具有某种社会地

位或特定身份的人的一种行为期望，规范着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与他们的这种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边英杰，陈皆明，2013，p. 83）。

韩礼德（Halliday，2007，pp. 65 - 66）认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人”这一主题就已凸显在意识形态中。这里的“社会人”并不与个体人相对立，而是指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人。一个孩子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中，语言和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语言使其融入特定的社群，教育使其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社会符号学中的“社会结构”指的是权势和社会功能的秩序，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民族和群体中呈现分布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会作用于语言（丁建新，2007，pp. 95 - 96），进而影响社会人，具体体现为：区分社会人的社会功能，明确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并通过规定情景中的意义与意义风格作用于社会人；通过社会等级差异影响语言，使其产生差别；作用于语域，使具体的社会语境产生意义（Halliday，2007，pp. 185 - 186）。

在社会结构的作用下，每个进入社会的个体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化后，这一社会人就要按其所属社会阶层和所在社会情景来言语、行为。具体说来，就是在特定的活动场合（语场）中，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语旨），运用合适的言语表达方式（语式）与在场的其他社会人交流。译者就是一类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掌握多种语言及其相应文化的社会人。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译者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不同作用，占据不同角色，角色间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关系，如父母、子女、同事、朋友、译者、诗人、作家、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等等。根据译者与其他社会人的不同关系，某一个角色凸显，其他角色处于暂时隐形状态。翻译活动中，译者这一角色成为这类社会人的主导角色，与更多的甚至不在同一时空的其他社会角色（作者或者其他译者）发生关联，与他们依存互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遵守与其地位身份相一致的权利、义务规范，并践行相应的行为模式。翻译是人类最复杂的社会活动之一，在不同的阶段，译者还会因活动内容的不同衍生出一些伴随或者辅助角色，帮助其更好地完成翻译活动，因此，译者本身就是一个角色集，在翻译活动中时时在不同角色间调整、变换和转化。斐洛（J. Philo）评价《旧约》的72名希腊语译者时，就认为他们成功地扮演了“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曹明伦，2016，p. 113）。

自翻译活动存在以来，译者这一角色便存在。西方的译者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在我国，西汉戴德在《礼记》中就曾提及古代文献中用“寄”“象”“狄鞮”和“译”来称谓有关外事的官衔（1912—1949，

p. 41)。早期的翻译多以口头形式进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译者角色由来已久，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受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中的从属地位和“忠实性”翻译理念的影响（吴波，2004，pp. 38 - 39），译者处于隐形状态，未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关注，遑论对其作理论探究。虽偶有学者强调译者的独特创造力，如西方的西塞罗（M. T. Cicero）、哲罗姆（St. Jerome）、阿雷蒂诺（P. Aretino）、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等（谭载喜，1991，pp. 68 - 89），我国林纾和严复也曾在作品中阐释个人的翻译动机和方法，但无人认为译者可超越作者。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迎来文化转向，译者从边缘地位慢慢向翻译中心靠拢，直至可主导整个翻译活动，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随着建构主义思想渗入翻译研究，学界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研究译者，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度，但“谁是翻译主体”的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如屠国元等（2003）、罗小姝等（2007）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译者是中心主体，作者和译者是边缘主体；还有学者如陈大亮（2004），认为翻译中只有译者一个主体，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三者各司其职。上述对译者地位和身份的考察都被涵盖在译学研究之下，是以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等学科对翻译的研究为基础，并未对译者做独立的本体研究。

20世纪60年代，Gustavo Pérez Firmat、Sherry Simon、Eva Hung和Edwin Gentzler等探讨了翻译与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文学身份和性别身份之间的关系，开启了译者身份的研究（谭载喜，2011，p. 120）。21世纪以来，Hubscher-Davidso、Johnsen、Cifuentes-Ferez、Shih、Khalaf、Liang、Aktener、Carter、Seracini等人比较关注译者行为，但大多考察译者行为规律、译者决策和思维等（陈静，黄鹂鸣，尚小晴，2021，p. 119），并未对译者角色做专门论述。国内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译者身份和角色研究位于译者行为研究的总体框架下，近十年呈现上升趋势。初期研究属于译者多重身份和角色的发现研究，如田德蓓（2000）、封宗信（2003）、陆钰明（2006）、陈月红（2006）、杨登新等（2007）、蒋林（2008），等等，以文学翻译为考察对象，分析译者作为“原文读者和译文创作者”“合作者和再作者”的双重身份，以及译者作为“读者、作者、创造者和研究者”“模仿者与创造者、原作者的仆人和译作的主人、学者与诗人”“选择翻译策略的交际者和决策者、具体翻译层面的阐释者和创新者”的多重身份，指明译者在翻译各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唯有认清自身是双重或多重身份的统一体，在遭遇异域文化

时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保证译本的质量，其翻译研究与实践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也有人认为译者只有一个角色——创造者，译者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创造空间，可利用各种方式，深入挖掘并呈现原文的深层含义，如李敏等（2009）、吴远庆等（2009）。

近十年，研究者们注重对译者角色本体的理论剖析。谭载喜认为“译者角色”即“译者身份”，且译者可扮演无数角色（2010，p. 202）。次年，谭载喜将“译者比喻”从“翻译比喻”中剥离出来，通过解码“译者比喻”，认为译者身份有主次之分，前者是根本，具有恒常性，失去它，社会行为人就脱离译者范围；后者是变体，是前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形式（2011）。2014年，于艳玲在承认译者的基本角色和次要角色的前提下，分析了译者职业的社会性引发的角色冲突，并建议加强翻译伦理研究，以改善译者角色间冲突。同年，周领顺辨析了“身份”与“角色”的差异^①，认为前者是语码转换者的特征，属翻译的范畴；后者是译者作为社会性表演者的特征，应对社会需求，应用翻译中译者的角色化过程更明显。据笔者查，国内译者行为研究的集大成者为周领顺，他就该领域发文70多篇，出版专著2部。周领顺将译者身份的研究扩展到应用翻译领域，并提出“求真-务实”连续统，对译者在翻译内和翻译外的译者身份和译者角色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受其影响，学界近期的发文多探讨译者在翻译内和翻译外的角色互动，如曹明伦（2016）分析了语域影响下儿童文学译者扮演的社会角色；王菲（2018）分析了新闻编译中译者所充当的译者和编辑的双重角色，以及二者间的竞争与合作；朱峰（2019）通过分析典籍翻译中副文本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指明译者具有“译者+学者+评注者+文献消费者+文化协调者+文化创造者”的融合身份，并且融合身份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

总的来说，国内对译者角色的研究日趋深入，但规模尚小，角度有限，我们应该借鉴更多学科，如认知学、符号学、阐释学的成果，从更多元的、更广阔的视角对译者角色展开本质研究与参照研究，更客观准确地认识译者的本质，促进翻译伦理和翻译标准等相关范畴的研究，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①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身份”和“角色”的定义，周领顺认为二者存在差异。从符号学角度看，“身份”和“角色”都是符号，用来再现社会人的某些方面的特征，由此使个体成为与自身有关联但又不同的“另一个”社会人；从米德对“角色”的界定和韩礼德对“社会结构”和“社会人”的界定来看，“角色”与“身份”基本相同。本文与多数研究者一致，使用“角色”一词。

二、译者角色的演变

纵观中外翻译史，译者的地位和角色可谓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在西方，圣经翻译中的译者被比喻为传声筒；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掠夺和侵略态度，译者成了侵略者；17世纪以来，随着翻译界对异域语言文化地位看法的改变，译者又开始分侍二主；结构主义时期，语言的确定性得到关注，强调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规律，译者成为语码转换机器；20世纪中后期，文化学渗入翻译研究，刺激了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译者挣脱了所有束缚，成为解放者和改写者。在中国，译者虽没有如此生动的形象变化，但通过翻译标准同样可以发现译者曾经扮演的角色，如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都强调忠实于原作，译者始终扮演着“隐形人”的角色；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译者的主体性才得到张扬，地位逐渐彰显。（廖晶，朱献珑，2005，pp. 14 - 18）乍看上去，这些对译者角色及其演变的界定与分析都有理有据，原文本的特殊性、语言观和文化观的渗透、翻译标准、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哲学等都会作用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进而影响对译者角色的判定。但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上述种种界定都没有从翻译的实质出发，也没能体现译者的本质。下面我们从“社会结构”和“社会人”这两个概念出发，分析上述形象设定的片面性，探讨译者角色演变的根本原因。

韩礼德定义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只针对具体社会。我们生活在“地球村”时代，受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影响，世界成为社会，各个国家或民族成为社会人。根据经济、科技和文明等的发展状况，国家与民族之间同样存在功能和秩序的不平衡。从广义的社会结构来看，在世界范围内，翻译的使命始终是根据不同时期国家间的强弱态势输入和输出文明，大多是从强势流向弱势，促进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翻译发挥着文明调节器的作用，译者自然就成为文明调节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从狭义的社会结构来说，在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翻译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同样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对译者选材的影响。译者可以顺主流意识形态之势而下，为社会发展推波助澜，也可以迎主流意识形态而上，力图改变，引领社会进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势正盛，辜鸿铭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对外翻译中华典籍，旨在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和对中华民族的歧视，进而劝西方放弃侵略中华之策；在微观层面上，社会结构通过主流诗学来影响译

者的翻译策略和表达方式。如庞德（E. Pound）采用拆字法来翻译儒家典籍，重“象”轻“意”，正是受了意象主义运动诗学风格的影响。

社会人的身份会对译者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语行为加以规定和限制，但不会抹杀译者作为个体人的鲜活特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定体现出主体性，只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翻译中和翻译的不同阶段所体现的强度不等。结构主义范式下的翻译研究关注语言中的同构现象，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不同语言中同构关系的替换。这种将翻译研究放在“真空”环境下来剥夺译者主体性的理念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其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均受到时代、历史、民族、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绝对的同构关系在不同的语言中不可能存在，语言自身的离散性、模糊性和多功能性也使得译者在符号转换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选择，翻译实践中译者的选择恰恰体现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译者只有原始冲动，仅满足个人需要也是不够的，因为作为社会人，他要扮演好特定的角色，完成特定的行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使异域文明成果在译语国家得到顺利传播，得到预期读者的接受并喜爱。因此，译者的选择不能仅限于符合自身的审美情趣，否则翻译就不成其为翻译。语文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认为译者可以凭借主观直觉凌驾于文本之上，显然是不客观的。

韩礼德所谓的“社会”并非由一个个独立的参与者构成，而是像蛛网一样，由关系联结而成，社会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Halliday, 2001, p. 14）。译者参与翻译活动，与其他社会人发生关系。在翻译的不同阶段，译者扮演着读者、阐释者和译文作者等不同角色，随着角色的转换，译者的主体性也逐步得到提升，但不能据此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中心和唯一主体。解构主义宣称“作者死了”，解构了原文本的意义，否定翻译活动中其他社会人的参与和作用，认为译者可以任意操纵和改写原文，这就斩断了译者周围的社会联系，从根本上否定了译者的社会人身份，使译者不再存在，翻译无法进行。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翻译这一社会活动产生的动力源自社会结构，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都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译者作为社会人，处于不同的符号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自身的多个角色协同作战，同时，也要与关系中的其他社会人协商共赢。因此，不能将翻译看作纯语言转换活动，隐藏文明流动趋势，遮蔽译者作为调解人的作用；也不能只凭借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或者译文的表达方式而武断地界定译者的角色，因为那可能只是“千面人”的一面；更不能否定译者

的社会人本质，任意切断他与一些社会人的联系，迫使其依附或迎合另一些社会人。应该从多元和多级的视角客观描述译者的角色，肯定其作为自然人的鲜活性和主体性，更重视译者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发掘其与周遭的关联性以及在特定活动中的受制性。

三、译者多维角色的描述

社会符号学是韩礼德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系统功能语言学改变了形式主义框架内对语言的封闭、静止的心理学研究路径，而开始从功能主义和社会学视角研究语言。相应的，社会符号学与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索绪尔符号学也具有对立性，前者重视话语，关注符号的历时研究，以“三元进路”为主；后者则重视语言，关注符号的共时研究，以“二元进路”为主。可见，二者属于相反的研究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有做出成绩的符号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皮尔斯(C. S. Peirce)思想的启发(赵毅衡, 2014, p. 10)，韩礼德也不例外。皮尔斯曾说：“一个人并不是绝对的个体，他的思想是对另一个自我的言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另一个自我会进入生活”(CP 5. 421)，即“自我”隶属于某个社群或社会，与社会符号学中的“社会人”概念无二。皮尔斯将符号界定为“相对于某人在某个方面能代替(代表、表现)他物的某种东西”(霍克斯, 1978, p. 130)，认为符号是由“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构成的三位一体(CP 8. 342)。

符号或再现体是可能性存在，是独立自在的存在样式，无关其他事物，是一种感觉质，属第一性；对象往往涉及他者，是相对的存在形式，是一种实际存在或者事实，属第二性；解释项起到连接第一项和第二项的作用，属第三性。(皮尔斯, 2014, pp. 14 - 24)“解释项”这一概念的引入使符号具有了动态。皮尔斯认为解释项内容丰富，是符号接收者根据符号产生的思想、反应或对符号进行的解释等(CP 5. 284)。他进一步将解释项分成“意向解释项”(intentional interpretant)、“效力解释项”(effectual interpretant)和“交际解释项”(communicational interpretant)(CP 4. 535)，其中的“交际解释项”又称为“最终解释项”，往往体现为法则、习惯和规律等，由“探究社群”足够多的探究形成(CP 8. 814)。可见，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使用的符号，符号得以存在正在于人对其意义的不断追求和衍义，这种探索行为发生在社会中，具有社群性，而符号的最终意义趋向于被这一社会群体

统一认定的意义。解释者对符号的解释会存在差异，受“我们过去生活经历的认识结果”影响（CP 2.84），也可以说受社会人成长环境，即所处社会结构影响。符号过程就是符号不断被解释的过程；如果说“解释就是翻译”，那么符号过程就是符号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翻译活动就是译者这一社会人在社会结构作用下进行的符号解释过程。

作为社会人，译者生存的环境既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包括其他人，是一个多维空间。译者不仅与客观物质世界中的语言和文本等相关联，还与翻译活动中的其他社会人，如作者、原文读者、译文读者、赞助商、出版商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皮尔斯的符号三位一体模型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包含译者的翻译三位一体模型图：

(1) 作者与译者的社会符号关系：译者通过译文成为作者的符号/再现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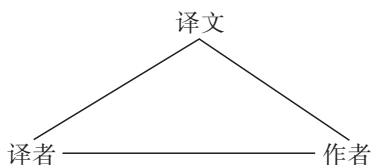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三位一体模型（作者与译者）

(2) 译文、原文与原语文化、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符号关系：译文通过译者成为原文和双语文化的符号/再现体，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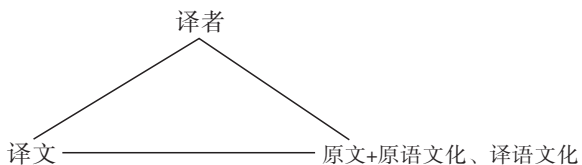


图2 翻译三位一体模型（译文、原文与原语文化、目的语文化）

翻译三位一体模型图中译者和译文作为第一项出现在符号解释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在未能表征作者、原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情况下，二者作为一种符号独立存在。译者只是掌握双语、熟知双语文化的某类社会人，处在某种社会结构中，而译文存在于译者的头脑中，呈现为碎片化的话语或知识图谱，等待着译者随时抽取，用来表征某一具体对象。图1中的作者是对象，作为第二项，决定（specialized，指被专门化或限定）（Peirce, 1998, p. 497）译者，并间接地决定译文。皮尔斯又提出“直接对象”

□ 符号与传媒 (25)

(immediate object) 和“动力对象”(dynamic object) 的概念, 直接对象指符号自身的本质信息, 而动力对象是“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世界的一般知识”(丁尔苏, 2012, p. 56), 是符号使用者所具有的与该符号相关的知识集合体。也就是说, 作者使译者由潜在译者成为具体翻译中专门化的、实际存在的翻译主体, 但译者只是在某些方面表征作者, 并使译文(解释项)在某个特定的点上指向作者的某种风格或形象。如郭沫若通过翻译雪莱(P. B. Shelley)的诗文, 表征了雪莱反专制革命战士的形象。再如严复将赫胥黎(A. L. Huxley)关于生物进化原理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时政警文《天演论》, 通过在译文中将社会变革类比为自然界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 表征改革者的形象, 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

图2中的原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是第二项, 是对象, 由译文表征, 解释项是译者, 将原文、原语文化、译语文化与译文连接起来。在整个符号过程中, 符号必须再现对象的某种品质, 即符号与对象间必定共享某种品质, 这种品质是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连接媒介, 限定了解释项对这一品质的衍义路径(CP 2. 49)。进入翻译过程后, 由于原文的存在, 原本在译者头脑中的碎片化话语和知识图谱开始组合、成形, 译文逐渐由感觉质变清晰, 与原文在内容或者形式上保持同质。相应的, 原文中的原语文化也会以某种形式再现在译文中, 同时, 为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顺利传播, 译语文化的品质也会部分再现。译文的语言属于兼具原语和译语特点的间性语言, 而译文内所呈现的文化也是一种“交互文化”(Pym, 1998, p. 177)。为使译文与原文、原语文化、译语文化共享某种品质, 译者就要通过各种手段使直接对象(原文和双语文化中的固有信息)与动力对象(译者具有的与其相关的认知信息)尽量贴合, 减少效力解释项(译者的理解)与意向解释项(作者的意思)之间的差异, 并使效力解释项不断趋向于最终解释项(得到译文读者和译语文化肯定的意义), 直至融合, 实现共同解释项的三元传播(赵星植, 2017, p. 94)。

皮尔斯除了对符号三项进行划分外, 还依据符号三要素间的关系, 将符号进一步分为若干类别, 常见的有如下三类: 第一类, 根据符号自身的呈现方式, 分为质符(qualisign)、单符(sinsign)和型符(legisign); 第二类, 反映符号与对象项之间关系的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 第三类, 反映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呈符(rheme)、申符(dicent)和论符(argument)(CP 2. 243 - 252)。具体见表1:

表1 皮尔斯对符号的分类

—	再现体/符号	对象	解释项
再现体/符号	质符	像似符	呈符
对象	单符	指示符	申符
解释项	型符	象征符	论符

从翻译三位一体模型图2可知,译者既是再现体,又是解释项。根据表1,每一项又可分出三位。译者作为再现体,就可分出质符、单符和型符三个下位符号;译者作为解释项,又可分出呈符、申符和论符三个下位符号,具体见表2:

表2 对应皮尔斯符号分类的翻译三位一体

翻译过程		再现体 (译者)		解释项 (译者)
译前	再现体 (译者)	质符	再现体 (译文)	呈符
译中	对象 (作者)	单符	对象 (原作、原语文化、译语文化)	申符
译后	解释项 (译文)	型符	解释项 (译者)	论符

译者作为再现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通过译文代表作者这一对象,是作者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化表征者。同时,译者作为解释项,共享译文与原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共同品质。上述二者是译者最基本的角色,贯穿翻译始终。具体到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受其阶段性工作内容的影响,译者又会扮演各种下位角色,即伴随角色或辅助角色。

译前,所有懂原文和原语文化并具备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读者都有成为译者的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是潜在译者,是质符,一种感觉质,但还不是实际存在的、针对作者这一对象的真正符号。译者作为有一定阅历的社会人,头脑中存在大量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可以被随意组合,所以,此阶段的译文在指代原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上具有模糊性和零散性,无关真假,无关对错,但限定了对符号意义解读的路径和选择的基本范围,是一种感觉质呈符(皮尔斯,2014,p.50)。

译中,译者进入基本角色,成为类符号,表征具体的作者,传递有关作者特性的信息,成为具体的存在,代表作者与读者展开交流(对于笔译来说

是虚拟交流)。每一个译者都通过与自身相关的语域（具体翻译活动中的时间、地点和主客体间关系）成为众多译者中的一个，他们之间不具有像似性，哪怕是同时代、同民族的译者。不同译者并不通过相互模仿来完成翻译任务，而是在把握原文意义和作者意图的基础上，提取原文和原语文化的信息，根据翻译目的，调取个人认知经验中的相关信息，结合译语文化的惯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再现原作。译文饱含着译者的气息，很多经典名著不断重译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因此，每位译者都是特定时空中的独立个体，表征着作者的某个形象，是单符。每一个译者的译文都是原文的变体，它们都指向原文，具有来自原文稳定不变的意义核。原文的这种不变意义核在不同的译者面前保持着共同的品质，就如同本雅明（W. Benjamin）所说的“种子”逻辑，给译文发出成长的指令，“长成”的译文虽不能与原文完全一致，但必定源自原文，是其结果，不可能完全偏离原文（金敬红，2011，p. 171）。因与具体的原文、原语文化、译语文化相对应，译者头脑中的呈符便会逐渐失去模糊性，所作解释与具体语境相关联，确定性得到提升，由此，作为申符的具体译文出现。此时的译文毕竟是每个译者个人经验认知的结果，属于个别的体验，尚不能全面和准确地表征对象。

译后，所有译者的译文都共享原文和原语文化、译语文化的品质，是原文的一般类型符号，具有型符的特征。这时，译者的辅助角色——校验者或者编辑者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从单个译者的翻译校验活动来看，译者参照原文核对译文，针对预期读者调整表述，逐渐趋向最终解释项，这时译者是论符，由辅助角色转化为主导角色；同一作品的不同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结合个人的理解，对不同的申符（不同译者的译文）进行比较论证，论证的结果就是得出一个更高层次的解释项——最终解释项，使读者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 and 原文的意思，进而达到视阈融合，产生共鸣。

四、结语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行为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明传输的途径，会受到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文化强弱态势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微观的社会结构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社会结构通过语言作用于社会人，使译者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集合。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内外都会得到体现和延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翻译阶段，其角色化呈现出多维性。角色化的译者行为所产生的译文自然也是角色化了的译

文(周领顺, 2014, p. 22), 因为具体社会情境中参与符号活动的社会人及其相互关系被社会结构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作为符号的译文必定体现这种意义, 严复所译《天演论》即为明证。基于此, 我们认为翻译标准应该是多元的、描述性的, 每个译文都是原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动态解释的结果, 带有局限性和阶段性。随着译者比较论证工作的推进, 我们必定会在未来得到一个更高级的解释项, 更趋近完美的符号效果, 并为不同阶段的解释提供一个评判的标准。

引用文献:

- 边英杰, 陈皆明 (2013). 社会学概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曹明伦 (2016). 语境再现和译者的虚拟社会角色——兼谈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 中国翻译, 1, 112 - 115.
- 陈大亮 (2004). 谁是翻译主体. 中国翻译, 2, 3 - 7.
- 陈静, 黄鹂鸣, 尚小晴 (2021). 国内译者行为研究 20 年可视化分析. 外国语文, 6, 113 - 121.
- 陈月红 (2006). 从语篇翻译过程看译者的角色定位. 湘南学院学报, 4, 48 - 55.
- 戴德 (1912 - 1949). 四部丛刊·大戴礼记一.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丁尔苏 (2012). 符号与意义.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丁建新 (2007). 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 社会符号学模式.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封宗信 (2003). 文学语篇的多重结构与译者的多重角色. 中国翻译, 3, 29 - 31.
- 霍克斯, 特伦斯. (1978).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瞿铁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蒋林 (2008). 后殖民视域: 文化翻译与译者的定位. 南京社会科学, 6, 146 - 151.
- 金敬红 (2011).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168 - 172.
- 李敏, 陈梅霞 (2009). 从海德格尔本体论角度探讨翻译的“还原”——杨必《名利场》译文个案分析.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6, 161 - 165.
- 廖晶, 朱献珑 (2005). 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 中国翻译, 3, 14 - 19.
- 陆钰明 (2006). 论诗歌译者的多重角色.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39 - 143.
- 罗小姝, 杨红 (2007). 论翻译的主体——译者.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30 - 134.
- 皮尔斯 (2014).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谭载喜 (1991). 西方翻译简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谭载喜 (2010). 比喻话语与翻译认知: 一个跨文化的视角. 载于任东升 (编).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谭载喜 (2011). 译者比喻与译者身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16 - 123.

□ 符号与传媒 (25)

- 田德蓓 (2000). 论译者的身份. 中国翻译, 6, 20 - 24.
- 屠国元, 朱献珑 (2003).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 中国翻译, 6, 8 - 14.
- 王菲 (2018). 传播媒介中译者形象的凸显及其社会化角色. 青年记者, 9, 41 - 42.
- 吴波 (2004). 译者地位边缘化成因及其对策初探. 国外外语教学, 1, 38 - 41.
- 吴远庆, 张福勇 (2009). 译者的角色: 水下冰山的发掘者——以海明威短篇小说《大双心河》的翻译为例. 外语与外语教学, 7, 52 - 55.
- 杨登新, 李小敬, 井爱丽 (2007). 趋同与关联制约下的创造性叛逆——从译者的双重角色发起的革命.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3, 67 - 71.
- 于艳玲 (2014). 社会角色视域下译者的立体性角色解析.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929 - 932.
- 赵星植 (2017). 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 国际新闻界, 6, 87 - 104.
- 赵毅衡 (2014). 回到皮尔斯. 符号与传媒, 2, 1 - 12.
- 周领顺 (2014). 应用翻译之译者角色化行为分析. 当代外语研究, 2, 21 - 24.
- 朱峰 (2019). 深度翻译中的译者角色于翻译策略. 中国文化研究, 冬卷, 149 - 159.
- Halliday, M. A. K. (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alliday, M. A. K. (2007). *Language and Society*.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Nida, E. (1982). *Translating Meaning*. California: San Dimas.
- Peirce, C. S. (1931 - 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ym, A.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作者简介:

佟颖,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翻译。

Author:

Tong Ying,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uropean Language School,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socio-semiotic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Email: 19463808@qq.com